

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

校训

戴裔煊文集

蔡鸿生 编

●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國立中山大學

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

蔡鸿生 编

戴裔煊文集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戴裔煊文集/蔡鸿生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11

(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

ISBN 7-306-02393-4

I. 戴… II. 蔡… III. ①戴裔煊—文集②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4378 号

责任编辑	熊锡源
装帧设计	方楚娟
责任校对	易正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电话(020)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电话(020)84111998, 84111160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	510275
传真	(020)84036565
印刷者	广东南海系列印刷公司
经销者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规格	635mm × 960mm 1/16 24.75 印张 323 千字
版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



戴裔煊
(一九〇八年至一九八八年)

毛主
席論
漁家
傲

第二次大團圓

戴商煊敬书

“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总序

黄达人

在中山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之际,“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出版了。将我校已故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著作结集出版,这是我们对先贤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作为后学的责任。

中山大学八十年的光荣历史,是广大师生追求真理与光明,参与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是历代学人引进、创新、传播现代科学和文明的历史;是杰出学人辈出、人才培养繁盛、教学科研精进日新的历史。在中山大学的发展史上,镶嵌着一代又一代著名学人的名字,陈寅恪等一批人文大师以他们在文、史、哲等各领域的宏大建树,奠定了中山大学人文学科的学术传统,也奠定了中山大学作为中国名校的地位。

在为学上,他们不计名利得失,视学术为天下公器,以学贯中西的远见卓识不遗余力地吸收新知识、新观点,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为人上,他们不侮食于自矜,不曲学以阿世,忠于良知,敢于坚持。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的闪光。

他们的精神随着他们的著作在世间不息地流传,随着时间的流逝,披沙见金,更见珍贵。

文库中所收的著作,在学术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时间已经证明,它们是薪火承传的中国文化的座座丰碑。这些著作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乃至学术规范,更是后学者得窥学术门径、走上学术道路的指南之针。

在这些著作的字里行间,透露着著作者鲜明的学术个性,

同时又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共性,就是它们无不体现了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人生永不放弃的勇气。

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为中山大学营造了良好的学风,丰富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术传统,积聚成我们这所大学珍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这些后学者以无尽的精神力量。

因陈寅恪先生的文集早前已出版多种,尊重陈先生女公子的意见,本文库没有编入陈寅恪文集。但我校蔡鸿生教授新近出版了《仰望陈寅恪》一书以及中山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陈寅恪诗词笺证》一书,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中山大学的理科和医科同样是大师云集、群星灿烂,理科和医科的杰出学者文库也将在适当的时候出版。

我深信,这次出版的“中山大学杰出人文学者文库”,必可嘉惠学林,裨益后世。

是为序。

二〇〇四年八月十八日于康乐园

前 言

戴裔煊教授是一位有多方面建树的历史学家,对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作过卓越的贡献。他朴学惇谨,既精且博,在平凡、淡泊的学术生涯中,显示出纯正学人的光辉。无论学风还是学问,都足以昭示来者。

戴先生 1908 年 12 月 28 日生于广东阳江,1988 年 9 月 12 日病逝于广州。自幼力学,工书法,勤记诵,被乡亲誉为“读书种子”。1929 年,由中山大学预科升本科历史系,在朱希祖和朱谦之先生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南蛮之史的研究》,取得甲等成绩。1934 年毕业后,在中学任教数年。1940 年,再度进中山大学深造,在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至 1942 年毕业。在朱谦之先生指导下撰写的学位论文《宋代钞盐制度研究》,长达 40 多万字,对宋代盐业的生产和运销,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综合研究,阐明了钞盐制度起源和演变的全过程。这部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方面具有开拓性的专著,1957 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1981 年由中华书局出新一版,博得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牟润孙先生在《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一文中,对此书赞扬备至:“作者引用宋代著述二百余种,于宋代售盐给钞制度之实现、沿革、官员、地区,以及此制度对国计民生之关系与影响,无不溯其本源,明其流革。考证至为细微,叙述亦颇能得其体要。治宋史与经济史者,苟不洞悉两宋钞盐制度,则宋代政治与社会上若干问题,均不易得其解释。作者斯编实以钞盐制度为中心,对于环绕此制度诸问题,均有极深刻之探讨。”

抗战期间,戴先生由粤入川,供职于重庆的中山文化教育馆,致力于民族学史和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工作。他广泛搜集中国西南民族的原始文化资料,运用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取得一

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关于僚族的渊源及其文化,关于西南民族干栏式建筑的结构和功能,以及棉花和棉织技术的传播,等等,都是在艰难岁月中的精心之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抗战胜利后,戴先生自渝返穗。1946年至1949年,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兼广东省立法商学院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继续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他后半生倾注心力最多的学术领域,一为中葡关系和澳门史,一为中外关系史。其业绩表现出一位历史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才、学、识、德在研究实践中的统一。

戴裔煊先生是中葡关系和澳门史研究的著名先驱,早在1956年,就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他曾经夫子自道:“我研究澳门史,就是为了证明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完全有权收回澳门。”考虑到《明史》的《佛郎机传》是基本历史文献,戴先生辑录相关的中外记载,博考详辨,补阙订误,澄清了历史认识上的种种混乱。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均因他的精勤探索而真相大白。

中外关系史尤其是海外交通史的研究,几乎与戴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相始终。他早年已考释过“阿拉伯”名称在中国古籍中的转变,中年之后,又以宋代三佛齐重修广州天庆观碑记为中心,阐述了中世纪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友好交往和贸易关系。同时,还进一步拓展领域,揭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以及中国铁器和冶铁技术西传的历史。此外,戴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项别开生面的研究,即明代后期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其鲜明的特色,表现在用世界史的通识考察了16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的社会变迁,发前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

戴裔煊教授是一位纯正的学人,无论教学还是科研,其宗旨一贯是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他重义轻利,爱护后辈,待弟子如子弟。经常告诫学生:“读书人要重视操守,不要采取狭隘的功利主义,知识的价值是不能完全用金钱去衡量的。不要把自己的学问当作商品到处吹嘘、叫卖。学问自有公评。用市侩手法做学问,也许会得意于一时,但终归贻误别人,为害自己。”

戴先生谦虚谨慎,敬重前辈,尽管自己卓有成就,仍称陈寅恪、陈垣两位史学大师为“二陈老师”。他以教授身份,同自己教过的学生坐在一起,认真倾听陈寅恪先生讲授《元白诗笺证稿》。戴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深受寅恪先生所器重,获得“后生可畏”的赞语。

戴先生平日寡言笑,少交游,一心扑在学问上。起居简朴,勤于治学而拙于治生。晚年的论著,都是在患高血压的长期病痛中完成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他在精神生产中表现出来的“春蚕”式的劳动,给后学者留下了可贵的激励和鞭策。

本文集共收论著 8 篇,分成三个单元,力求反映出著者在其致力的学术领域取得的业绩。除校改原文排印的某些错漏外,未作任何更动。

蔡鸿生

2004 年 5 月

目 录

民族文化史

- 干兰——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 3
棉种棉织流传入中国与西南民族的关系 62

中葡关系史

- 《明史·佛郎机传》笺正 123
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 214
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 246

海外交通史

- 宋代三佛齐修广州天庆观碑记考释 269
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
的萌芽 290
中国历史上对石油天然气的认识利用及其
与西方的关系 361

民族文化史

干兰——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

弁 言

著者搜集西南中国原始文化资料,经已多年,东鳞西爪,日积月累,颇有所得,以饥驱奔走,生活不安,迄无暇整理,斯篇为整理完成者之一。然亦于萧萧逆旅中,利用公退余闲为之,风檐寸晷,时作时辍,迁延数月,始克脱稿。著者企图用史地学方法,将西南中国原始住宅作有系统之探究。考查其名称之变异,形式之差别,特征之所在,及其所以产生之缘由。从空间观察其分布,从时间迹寻其变迁,所参稽载籍,虽广涉中外古今;然为环境所限,得书不易,仍自知坐井观天,所见甚小。脱稿后,承友人罗致平先生见告,谓在《东洋学报》第二十三卷见有一书评,为评论 Nguyen van Huyen 所著《东南亚洲棚居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Habitation sur Pilotis dans l'Asie du Sud-Est*, Paris, 1934)一书者,顾名思义,知其所研究者,正与本篇相同,惟内容如何,惜未获一读,不能不引为憾事。然虽未见其书,敢信彼此所用之方法与取材,必不相同,详略亦必互异,见解恐亦未必尽同,见智见仁,正好互相参证。

最近获读 Edwin M. Leob 与 Jan O. M. Brock 合著之《东南亚洲社会组织与长屋》("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Long Hous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 S. Vol. 49, No. 3, 1947)一文,语其内容,当然与余所研究者有关系,惟其主要目的

* 本篇曾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于 1948 年作为“专刊甲集第三种”单独刊行。

在分析东南亚桩栅长屋与母系及父系社会之关系,仍属初步研究,对此问题,未能根本解决。文中曾提及“长屋”出自云南及中国东南部,其理由则为云南边境“长屋”非常普遍。并认为此种“长屋”是由父系之藏缅语泰语部族及母系之印度尼西亚人从海南岛及柬埔寨传播入南海。余对此种见解,不敢苟同。屋之大小,并不一定与父系或母系社会有功能上联带关系,两种社会俱有,使分析徒费工夫。“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千余年来,经已如此,两氏不谙中文,对于汉籍记载,毫无所知,实则“长屋”并非一种特征,两氏不免有所误会,若故意谓与某种社会有关,无异投身网罗,无以自拔。至于此种文化之产生地区,从多方面观察,应为东南亚沿海,谓某族人为传播媒介,亦无确实证据。事贵有征,无征弗信,有所不知,不如宁阙,余认为文化史之研究,对于了解现在文化之构成,为一种不可少之方法,尤以探究西南中国原始文化为然,此不过其一端耳。

本篇全稿,承岑仲勉先生详细阅读一过,并提示种种宝贵意见,使著者得以补充修正,至堪感谢。又属稿时,承罗致平先生提示西文方面若干重要资料,并代借西文书籍多种。并承江应梁、刘伯奎两先生赐赠照片。付印时,得岑家梧先生之力至多,谨于此统致谢意。

1948年9月30日

著者识于广州

一、名称考释

1. 干兰、干栏、干阑、阁阑、高栏、搗栏等名称的比较

什么叫做“干兰”?简单地说,“干兰”是古代流行于中国西南部蛮族的住宅的通称。

最初我读《魏书·僚传》^①、《周书·异域传·僚传》、《北史·蛮僚传》、《通典·边防典》,都见得有同样的记载,说僚人的住宅:

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

后来又见到《旧唐书》卷一九七与《新唐书》卷二二二的《南平僚传》亦称：

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三“宾州风俗下”又称：

悉以高栏为居，号曰“干兰”。

又同卷称昭州风俗同宾州，则昭州的住宅也叫做“干兰”，殆无疑义。据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十，宾州，太平兴国四年废，即今广东信宜县。《九域志》卷九，昭州平乐郡治平乐县，即今广西平乐县。

根据上面所引之文，我们知道由南北朝以至于唐，僚人的住宅叫做“干兰”或“干栏”。宋代广东西部及广西东部土人的住宅叫做“干兰”。广东西部以及广西东部的土人是属于什么族？乐史未有明言。是不是僚？我们再从地理上研究，便可明白。

僚人的所在地，根据古籍所说，可以约略得其轮廓。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谓“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晋书·李势传》及李石《续博物志》卷三引《宁国论》之文，大略与《华阳国志》同^②，晋张华《博物志》谓“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魏书·僚传》、《周书·异域传·僚传》、《北史·蛮僚传》则谓“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从上述各种记载观察，可知僚人所在地，西北边由今陕西西南部以迄四川西部，东边自四川东部迄贵州北部皆是。唐代的南平僚所在地，据《新唐书》卷二二二谓其地“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距南州，北涪州”。智州为汉牂牁郡地，唐高祖武德二年置义州，五年改称智州。贞观十二年改为牢

州,在贵州石阡府龙泉县西北。渝州即唐南平郡,今四川巴县治。南州故治在今四川綦江县南,涪州今四川涪陵县。其地域由四川东部起,至贵州东部。蜀李势时代(公元341~347)的僚与唐代南平僚的分布区域相比较,南平僚的分布区域似乎缩小了一些。事实上,本来僚族所占据的区域,在西北边没有那样广。李势时向西北活动移徙,攻占郡县,就伸展到陕西西南部及四川西部。关于僚人的迁徙分布,国内学者大都根据上述含糊的记载,作种种推测。因而有谓出自西羌的,外国学者亦一致主张其人由北方南徙。其实对于中国史实未尝深考。后魏酈道元《水经注》已经有很明白的记载:《水经注》卷二〇明言“李寿之时,僚自牂牁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宋郭允《蹈蜀鉴》卷四亦云李寿“从牂牁引僚入蜀,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人从什么地方入蜀,这是一种很明白的说明。所以僚人分布的地区,应以《新唐书》所述者较为准确。由四川东南部起,直至广西东南部,广东西部亦有其族属。在唐代是这样。在唐以前,其族分布于西南中国应该更广,因逐渐与我群同化,与齐民等列,即使他们本来为僚,久而久之,渐染了华风,也不作僚看待了。广东西南部的“干兰”,无疑是他们的住宅。

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在这个广大区域里的僚人的住宅都叫做“干兰”。“栏”、“阑”与“兰”是同一音的异写,写哪一个都无关轻重的。

又考《太平寰宇记》卷八八《剑南道昌州风俗下》云“无夏风,有僚风。悉住丛箐,悬虚构屋,号‘阁阑’”。同书卷一三六《渝州风俗下》亦云“今渝山谷中有狼倭,乡俗构屋高树,谓之‘阁阑’”。“阁”“干”音近,又是一种异写。

唐樊绰《蛮书》卷十引《后汉书·南蛮传》槃瓠故事,其最末一节谓“缉草木皮以为衣服,帝赐以南山,仍起‘高栏’为居,止之。其后滋蔓,自为一国”^③。明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卷十八《风俗》述及高州“田女盛服椎髻跣足,聚而作歌,重以‘高栏’为居,故有‘高栏’之号(已上各县皆然)”^④。张庆长《黎岐纪闻》亦谓黎人住宅有“高栏”、“低栏”之分。凡此所谓“高栏”,也是一种异写。